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复旦博学·文/学/系/列·精华版

文化研究概论

陆 扬 /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http://www.fudanpress.com.cn>

“十五”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G0/38

2008



复旦博学·文/学/系/列·精华版

文化研究概论

陆扬 /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http://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概论/陆扬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
(复旦博学·文学系列精华版)
ISBN 978-7-309-05835-2

I. 文… II. 陆… III. 文化-研究-概论-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903 号

文化研究概论

陆 扬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 丹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66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978-7-309-05835-2/G·727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撰稿者：

陆 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写作第一、三、九章)

刘 康(美国杜克大学中国传媒中心教授,写作第二、四章)

何成洲(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写作第五章)

周 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写作第六章)

王 宁(清华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写作第七、八章)

马 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写作第十、十一章)

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写作第十二章)

张平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写作第十三章)



导 言 跨学科的文化研究	1
第一章 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	9
第一节 利维斯主义	9
第二节 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14
第三节 威廉斯：文化是普通平凡的	17
第四节 霍尔：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	21
第五节 伯明翰中心的兴衰	24
第六节 从文化主义到霸权理论	28
第七节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	34
第二章 文化研究的方法、现状与中国意识	39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39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学术建制	42
第三节 文化研究的方法	44
第四节 文化研究的社会关怀	46
第五节 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基本现状	51
第六节 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问题	54
第三章 文化与阶级	58
第一节 阶级的阐释轨迹	58
第二节 威廉斯的阶级考证	61
第三节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64
第四节 后工业社会和阶级变迁	66



第五节 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	70
第四章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76
第一节 后殖民主义的缘起	76
第二节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80
第三节 斯皮沃克与霍米·巴巴	82
第四节 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	85
第五节 后殖民主义中国学批判	88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	90
第五章 性别研究	96
第一节 性别的定义	96
第二节 女性气质	98
第三节 女权主义	101
第四节 后女权主义	107
第五节 男性气质	110
第六节 性别和语言	113
第七节 男性凝视	116
第六章 视觉文化	120
第一节 何谓视觉文化	120
第二节 视觉权力	123
第三节 视觉消费	129
第四节 虚拟现实	133
第五节 读图时代	138
第六节 奇观电影	143
第七节 身体政治	148
第七章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15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全球化	155
第二节 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158

第三节	从经济走向文化的全球化	161
第四节	全球化语境中的英语普及问题	165
第五节	文化身份研究	169
第六节	全球化中的影视研究	172
第八章	文化研究抑或文学研究	179
第一节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	179
第二节	对峙还是共存	183
第三节	中国的文化批评	187
第四节	流散文学研究	191
第五节	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	194
第六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	198
第九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	203
第一节	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	203
第二节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代性反思	206
第三节	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	210
第四节	游荡城市的记忆	214
第五节	两种城市空间	217
第六节	建筑与革命	220
第十章	传播与文化	226
第一节	符号与信息	226
第二节	媒介与传播	229
第三节	大众传播及其社会效果	232
第四节	受众研究	237
第五节	传播的经济政治学研究	241
第六节	传播的文化研究	246
第七节	媒介帝国主义	250
第十一章	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	254
第一节	公共舆论和公共领域	254



第二节	新闻传播与政治沟通	258
第三节	西方的传播政策	261
第四节	新闻客观性	263
第五节	网络的民主潜质	266
第十二章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	271
第一节	文化产业的界定	272
第二节	文化事业的界定	275
第三节	世界文化产业市场格局	277
第四节	风险投资基金	287
第五节	文化产业的集群效应	290
第六节	“文化例外”原则	293
第七节	文化事业的运行与管理	296
第八节	我国文化事业的变革	298
第十三章	青年亚文化研究	302
第一节	什么是“青年亚文化”	302
第二节	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305
第三节	战后西方青年亚文化	307
第四节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311
第五节	当代中国的青年亚文化	316
人名译名表		319
后 记		328

导言 跨学科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准学科”，它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主张打破以往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两分，将整个社会生活纳入研究视野。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入大雅之堂，担当起颠覆统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批判使命。事实上，在今日全球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一路走红的现象背后，它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立场，始终是未有松懈的。特别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气候普遍右转，保守主义盛行，左翼批判理论在公共领域颇有难以为继之势后，也使更多的学者转移到文化研究麾下，以迂回方式来继续他们的社会批判。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研究进一步的跨学科发展趋势。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文化研究主要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内部发生和发展，今天已稳稳地在各大高校盘营扎寨，游刃有余斡旋在许多相关的交叉学科之间。这一点不同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发端于成人教育的路线。英国的成人教育和开放大学传统自有它的渊源，这个渊源其他国家未必一样具备。就此而言，中国的成人教育一定程度上相仿美国，迄今不成太大的气候。所以中国的文化研究应当说同美国比较接近，迄今主要是在高校的体制里面展开，思想起来便也情有可原。但即便是在美国，文化研究在高校里的地位其实也头绪复杂，几乎鲜有例外，它大都作为跨学科课程教授，或者成立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这一点，和中国目前高校里的文化研究课程开设，同样是相似的。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主要表现在它同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等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很多学科就是它从中脱胎而出的母体。同时，反过来它一方面在滋养和充实所有那些它受惠不浅的母体学科，一方面又对这些传统学科切切实实构成了莫大的冲击。在这里，我们想主要谈一谈文化研究同文学研究，以及同社会学、人类学和传媒研究的关系。

文学研究在我们的学制体系里，主要是由文艺学承担的。文艺学以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为其本位，这在这门学科宣告诞生以来，直到进入 21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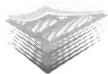
一直没有什么疑问。值得一提的是这门中文系的老牌看家课程,虽然过去一直叫做文艺理论,即便它使用的教材叫做“文学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或是名称叫做“文艺理论”,实际上却是清一色的文学理论。但是我们发现文艺学或者说文艺理论中的那个语焉不详的“艺”,近年在悄悄退居后台,反之它的文学本位性正在西方现当代学术的蜂拥东渐中与时俱进,日益理直气壮地彰显出来。这一点只消看一看近年出版的有关教材便知分晓,它们大体都叫做文学理论,其中有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1998)、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王一川的《文学理论》(2003)、董学文的《文学理论学导论》(2004)、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等等,作者都是文艺学圈子里的领军人物。可见,文艺学的内涵就是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实质就是文学研究,这不但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是天经地义的。

问题出在世纪之交。因为文艺学突然发现它的一部分得力人手移情别恋,移向了文化研究。不仅如此,假如文化研究同文艺学中的“艺”一端同根同种、声气相求倒也罢了,这样文艺学可以假借它学名里面的艺术含义,名正言顺地把它收入麾下。问题是此文化不同于彼文化。彼文化是文学及至艺术的代名词,此文化则说白了就是今天日常生活中的时尚追求,如是它首先是年轻人的文化。它同传统的文学概念既无多相干,同传统的艺术也相去何远。所以有人担忧,文艺学的文学研究传统要不要易弦更张,或者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不是一回事?它们中间有没有边界?两者之间又具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文学研究的边界肯定是存在的,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将继续存在。而就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来看,没有疑问这个边界应是开放性的、呈交叉状的。这并不是空话。文学曾经是文化的最高理念。英国 19 世纪诗人及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其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定义为光明和甜美,以文化为一个民族所思所想的最好的东西。而传承这个最优秀传统的媒介不是别的,据阿诺德和利维斯传统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观之,它就是文学。

但今天文学被边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其实从来就是在主流话语的边缘上流转生存。从历史上看,除了 19 世纪的西方各国,包括俄国以及 20 世纪迄止 60 年代初叶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占据过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但边缘并不意味没落。文化研究从广泛意义上说,亦不妨说是从文学研究中脱胎而出,比如它可以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独立的审美客体。同样它可以更多强调创作过程和阅读过程的文化语境,事实上文化研究的一些先驱人物如马修·阿诺德和 F·R·利维斯,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代传人雷蒙·威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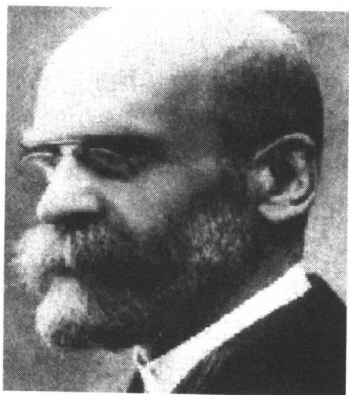
斯、理查·霍加特等,也都是道地的文学批评家。所以,假如文化研究的兴趣所向仅仅是时尚或者日常生活的枝节,那么多半它会有难以为继之日,届时从文艺学流失出去的文化研究队伍复归文学研究,如是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见证我们的文艺学如何将文化研究收编进来,该也不是天方夜谭吧?

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近年多次访问中国,就文学研究面临文化研究冲击的窘迫现状作过讲演,其文化研究反客为主,成为今日学院学术主流的描述,还受到过一些中国学者的质疑。质疑里面或者有一些误会,因为米勒无论如何算不上文化研究的代言人,而毋宁说是一如既往的文学研究的中坚人物。2006 年秋天清华大学的一次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讨会上,米勒作的题为《全球化和新电子技术时代文学研究辩》的发言,应能说明很多问题。他为之辩护的是书面文学,即白纸黑字的印刷文学。它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已是明日黄花了吗?其实未必尽然。米勒认为当今全球化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全球化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速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第二是全球化是异态纷呈而不是单一的事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就不相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则又是另一种模样,更不用说还有环境恶化的全球化,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第三,这一切全球化形式的公分母是电子通讯技术。就像当初《共产党宣言》精辟地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飞猛进,旧的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必有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出现,米勒认为,今天出现的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新媒体文化:电视、电影、流行音乐、互联网、电子邮件、播客、博客、音像、网络游戏,以及电子邮件传输的数码照片等等。而正是这些新的技术形式,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米勒举例 2005 年夏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面世之际,当时就有 150 万中国玩家订购这个游戏,一年之后,中国玩家的数量翻上一番,达 300 万。《魔兽世界》的巨大成功,正也可见出人类委实是需要虚构的东西。而比较传统文学,这些新媒体大都具有一些平易近人的特点,比如容易翻译,容易传输,容易适应世界的每一种不同文化。现代印刷文学则更多被圈定在母语上面,受制于本土地方文化的约束。为此米勒甚至戏拟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人类天生喜欢模仿的著名论断:人类天生需要虚构,虚构什么也不模仿。这样来看,今天相当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转向文化研究,来研究新媒体的语境和影响,便也是情有可原。虽然,米勒声明他现在想做辩护的不是图像替代文字的文化研究,而是正在消失的老式印刷书本形式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换言之,他要在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时代来为文学辩。因为文学可以言新媒体所不能言,为新媒体所不能为。的确,文学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东西,那是任何技术和技巧的迷恋所不能替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



究由是观之,我们相信它们能够和平共处,相得益彰,而且两者的关系盘根错节,肯定远不止于一个怀旧和时尚的二元对立。

再来看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它们是血亲还是仇家?似乎也难一言定夺。显然今天的文化研究对社会学构成了挑战。但事实上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人就是社会学家,许多社会学家也同样在从事文化研究。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学科分野比较模糊的国家,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融合较好。而像美国这样学科分类明晰,文化研究又大都在人文学科里安营扎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关系,就比较见出分歧来。社会学其实一向关注文化。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动因,它可以解释传统的回归,也可以解释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出现。文化使社会学的研究见出深度,尤其面对社会差异,每每能够以多元视野替补一元理性分析。这样来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韦伯对传统价值与新教伦理的比较,以及涂尔干对“失范”和集体表征的研究,都可视为早期社会思想家对社会文化内涵的关注。但是,假如按时下通行的做法,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符号形式,那么很显然文化分析理所应当有它自己的领域。比较来看,社会学的传统重心则是在科学上面。早在19世纪,作为社会学原型的人口统计学,其奉行的对社会给定事实的量化分析方法,就是典型的科学主义传统。而正是在这一背靠科学的氛围中,社会学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其中文化隶属于社会制度、社会过程、社会集团及其社会实践。个别的文化制品,比较它们的社会生成和接受语境,其本身的意义和形式是无足轻重的。



涂尔干

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社会学开始兴起,社会学历经了一个“文化转向”。文化转向意味什么?首先,它意味承认大众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与高雅文化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它意味社会学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性别、种族、科学和国家研究,必须与文化携手,方有可能得以建树其学科地位。最后,它意味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将是开放性的,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将被大量吸收进来。由是观之,文化社会学兼收并蓄,将大众文化、高雅文化特别是文化产品,包括它们的价值及其接受,以及知识社会学、文化资本、政治文化等等尽收罗中。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可以视而不见文化研究同社会学的差异。近年任教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社

社会学教授斯蒂芬·塞德曼,在他题为《相对的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挑战》^①文章中,就提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差异,至少首先见于符号学转向的问题。

所谓符号学转向,是指文化研究不同于社会学采用的统计学的理性分析方法,而是显示了文本分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符号分析的方法转向,虽然它同样有意识地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系统分析。如是社会现实将被视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的领域,而假如认可德里达“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命题,它还满可以被释为一个文本的世界,无论分析的对象是电视、电影、言情小说、时尚,或者各种亚文化现象。反过来社会学力求对社会作系统分析,其方法比较文化研究的多元视野,相对显得单纯。社会学家大都雄心勃勃意在全面理解社会,给社会提供全面整体的系统分析,这与经济学、政治学,甚或哲学和宗教等其他领域术有专攻的特点,都有不同。塞德曼认为文化研究的这一符号学转向,迄今尚未在社会学中发生。今日社会学的主导方法,无论是人口统计学、犯罪学还是组织社会学或种族社会学,基本上还是人文主义的方法,由此来建构特定理想形态的社会;抑或结构主义的方法,以潜在的“社会结构”来说明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如社会阶级、市场、人口、结构布局、网络设置等,都可以最终在社会基础结构中得以定位。说明文化研究历经了符号学转向,社会学则没有历经这一转向,可以从大众传媒的研究上见出一端。社会学的大众传媒研究偏重内容分析,找出分散的价值观念予以量化统计,由此分析传媒对受众的影响。但是文化研究把电影和电视看作符号和意义的内在秩序,致力于探究意义如何约定俗成为惯例所编码。因此意义就是解码的过程。有鉴于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解码和阐释习惯,所以意义也就五彩缤纷,显示出多元化的特征。如霍尔就多次强调意义的符号学内涵与其阶级的、政治的内涵,从来就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流动不居的。文化意义固然受制于权力关系,但是具有它们自己的内在秩序,其与社会结构与权力的关系,总是表现为一种相互渗透的经验分析。所以不妨说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开辟了一个社会分析的新领域,传媒、受众、亚文化、意识形态、共识达成、主导、抵制、权力等等,这些社会学通常忽略的话题,都成了热门研究对象。

文化研究的这一符号学转向同法国社会理论有相似之处,特别是波德利亚的早期著作如《生产的镜像》和《符号的政治经济批判》,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以及福柯的《戒律与惩罚》等。这些著作都与主流马克思

^① Steven Seidman, "Relativizing Sociology: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Elizabeth Long ed.,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主义和社会学传统分道扬镳,主张战后欧洲历经剧变,社会分析的传统语言如阶级斗争之类,已经不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所以文化研究与法国后现代理论似是异曲同工,充分重视大众传媒、信息技术、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商品化等等的新角色,认为它们标志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第二次社会大变革。

事实上今天社会学正在缩小与文化研究的距离,两者的交通也早有渊源。早在1978年,英国社会学学会第一次召开了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会,会上把“文化产品和实践”定位在物质条件和作为意义生产表现的作品之间,这是社会学第一次将文化和“意义生产”联系起来。更往前看,美国社会学发展成为羽翼丰满的独立学科,是以20世纪初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为标记的。由此而来的芝加哥学派,一开始就对文化具有浓厚兴趣。虽然,二战之后欧洲社会学异军突起,谨严科学的方法蔚然成风,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犹在,这个传统重视日常生活的社会身份建构,重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生产,这与文化研究,亦不妨说是殊途同归的。

就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关系来看,文化也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将文化定义为普通人的整个日常社会生活,更是受惠于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文化的起源》给文化所下的著名定义:

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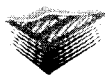
泰勒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是将文化和文明等而论之,较之先前主要从哲学、艺术和教育的视野来定义文化,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最好的思想和艺术遗产,以及个人修身养性的范式,泰勒的定义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它解构了文化高高在上的优越性,反之给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说明。文化作如是说明不仅涉及它的性质、范围、内容和意义,而且进化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不复是某些阶级的专利,相反恩泽广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错综复杂的总体”意味什么?它意味一个特定社会或社群的一切活动,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活动,而成为信仰、信念、知识、法令、价值,乃至情感和行为模式的总和。这一人类学的文化认知模态,我们发现和文化研究第一代传人雷蒙·威廉斯等人对文

^① Edward Burnett Tylor, *The Origins of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8, p. 1.

化的重新定义,读起来已经是十分相似。文化研究将社会生活视为文本,加以条分缕析,这非常相似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这一条分缕析过程中文化研究所通力标举的提倡深入考察对象的“民族志”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那里借鉴过来的东西。有人类学家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劫持”了人类学的“文化”。但是文化研究的此“文化”其实并不完全相似于人类学研究的彼“文化”。一般认为,人类学家感兴趣的是农村、社区,如社会底层阶级或移民的居住社区。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经验型的文化现象,如足球、百货商场、主题公园、旅游以及如电视、传媒、大众杂志和广告等大众文化形式。这些大众文化在传统的人类学家眼光看起来似还不够真实可信。但是毋庸置疑,今天文化研究热心的课题正在有条不紊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诸如电视、主题公园、消费文化的研究等。毕竟,文化是人类生活中最是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关于文化研究与传播学或者说传媒研究的关系,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第二代传人那里,都可见出一个明显的符号学转向或者说传媒转向。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干预精神,关注当代永远是它的学术所向,如果说这一当代语境曾经是摇滚乐这类青年亚文化,那么今天它理所当然就变成了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语境。如霍尔早在他1974年的《失范、政治与传媒》一文中,就围绕传媒,着重分析了“政治失范”的社会生产。霍尔发现传媒在当代社会中大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位,这就是被视为合法的政治异端声音,代表某一种社会抗议,所以是为“失范”。但是霍尔不是简单分析传媒表达的内容,而是采用符号学方法,把传媒看作一个编码的话语系统,由此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多数和少数、规范和失范、道德和颓废、成熟和不成熟等,霍尔认为它们就是彼时英国传媒表征的主体结构所在。当然光有符号学还不够,到头来这些各式各样的政治失范事件,必须回归到社会形态的层面上来加以分析。这样权力、意识形态、冲突这一类批判性概念,终究还是有了用武之地。霍尔的例子可以表明,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的亲缘关系,再怎么强调,是都不为过的。

今天国内高校已经在纷纷开设文化研究的课程。文化研究以全部社会生活的构成为其研究对象,强调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相互关系之中来考察对象,这决定了文化研究很难定于一尊的学科交叉性质,也决定了文化研究旨在更全面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的目的性。有鉴于此,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面向本科生的教材,在介绍文化研究基本知识的同时,把与这一跨学科、准学科互为交叉的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全球化、传播学,以及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内容,也攀缘着文化研究的脉络,一一叙述下来。得益于中国文



化研究这个开创性的事业,本书有幸请到国内外文化研究诸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为之撰稿,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大家。《文化研究概论》值此投石问路之际,能有这样的殊荣,不亦乐乎?

陆 扬

2007 年 9 月于复旦大学

第一章 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

文化传统上是精神生产的同义语,后来被释义成包罗万象的一切社会生活形式及其过程。更为晚近的定义,则把它看作意义的网络,以及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一般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文化。这三个方面分别是观念形态、精神产品和生活方式。观念形态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法律政治等等意识形态的东西。精神产品主要是指文学艺术和一切知识成果,图书馆和博物馆是它们最有代表性的场所。生活方式,则把我们的衣食住行、民情风俗、生老病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莫不囊括其中。这样来看,文化的概念真是大得没有边际,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的范畴。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里,凡不属于自然的东西,就属于文化。由此我们的一切知识探索,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文化的研究”。

这个大得无边无际的“文化的研究”,显然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指英国伯明翰的传统。它以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为标记,中心成立初衷之一是作为亚文化族群,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族群作出辩护,它的研究对象是阶级、文化和传播学,政治上属于“新左派”。20世纪6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无疑是给中心提供了大量的批判资源。用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中心是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在资本主义的光天化日世界里对话难以为继之后,退避学院搭建起来的一个避风港。中心是从成人教育起步的,最初是清一色的研究生教学。

本章将讨论伯明翰文化研究秉承的英国人文关怀传统,它的代表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霍尔,伯明翰中心的意义,同时就伯明翰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思想,作出一点比较。

第一节 利维斯主义

利维斯主义主要是指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的文化思想。它可视为后来伯明翰学派崛起的一个理论基础。F·R·利维斯是著名杂志